

数字化时代如何重构文化生态： 以全民阅读为例

谈稼宇¹ 王 兆²

【内容摘要】 技术进步在改变社会形态的同时，也重构了当代社会文化。计算机、数字化和互联网所催生的电子阅读，一方面使阅读形式更为便捷、资源更为丰富，一方面也带来了“浅读”等新问题。借用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有助于分析阐释当下数字化时代的阅读文化，同时也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理论，思考数字化时代改善全民阅读的启示性方法。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网络时代，传统阅读方法存在的基础早已受到电子阅读的极大冲击，而大学教育可以成为一种改善阅读生态的可能策略。从大学教育入手，让学生把注意力转向书本，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可以成为改变当下阅读文化状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 阅读生态 阅读方法 大学教育

【作者】 1 谈稼宇，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2 王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4）

2018年“亚马逊中国全民阅读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全民阅读呈现“纸电合璧”的趋势，有声图书市场迅速壮大。该报告认为，电子阅读有效促进了阅读总量。^①这标志着新媒介高速发展并对阅读形态产生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虽然近十年来在全民阅读活动的大力推广之下，我国此前读书人口与藏书数量减少、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态势逐渐得到遏制，但距离建成“经典人人爱”的“书香社会”还有一定距离。^②数字化阅读市场的日益普及和壮大，并没有带来人们所预期的阅读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而是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一矛盾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当代阅读文化的复杂生态，值得研究者深思。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生态问题

有学者集中研究了1978年至21世纪头十年的文学阅读状况，指出：“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个阅读高潮，但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阅读则进入—个缓慢的阅读衰退期；新世纪以来，衰退的进程明显加快。而导致文学阅读式微的原因虽然不少，但在种种调查结果的显示中，新媒介显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甚至主要角色。”^③从当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看，当代阅读生态—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科技革命对阅读行为方式的重构。算法、数字化和互联网三元结构催生了信息社会，^④而越来越多的技术新装置的出现，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大大改变了传统的针对纸质书的沉浸式阅读习性，各种电子阅读装置及阅读应用程序的出现，形塑了电子阅读，催生了“M—代”（媒体—代）。^⑤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0.8%，而数字化阅读方式（包括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6.2%，显然，“—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万人—网”的数字阅读方式已经呈现。^⑥

当电子阅读成为普遍阅读行为时，超文本的特性表露无遗，恰如率先界定“超文本”概念的尼尔森所言，超文本的阅读是非线性的，必然产生—系列链接和转移。于是，—种新的注意力模式便应运而生。阅读研究专家海尔斯指出了“M—代”与前辈人之间特有的“认知模式的代沟”。根据她的看法，电子阅读形成的“超级注意力”具有四个明显特征：在不同信息间转换；喜好丰富的信息；追求强刺激水平；不能忍受单调性阅读。而印刷文明的纸质书阅读培养的则是深度注意力，其特征与超级注意力的四个特性正好相反：专注—对象；忽略外部刺激；偏好—信息；对单调阅读有高度耐受力。^⑦

海尔斯对认知模式代沟和超级注意力的论述，很好地解释了算法、数字化和互联网三位—体的当代阅读生态所发生的深刻变迁。当下流行的阅读行为方式以搜索、扫读、略读、跳读等行为所构成的“徘徊式阅读”（reading on the prowl）为特征，很容易将读者带入“焦点碎片化”“注意力涣散”“痴迷于多重信息流动”“厌倦—的沉浸式阅读”“追求刺激”的阅读困境之中。

现在，哲学家伯格曼的“装置范式”理论所论述的各类装置在构建阅读范式时手段的隐蔽性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各种移动终端“超文本”和电子阅读器使阅读变得触手可及，但碎片化文本严重地降低了阅读的质量。聚焦碎片化、注意力涣散、痴迷于多重信息流动、沉浸式阅读衰落、追求刺激等阅读障碍十分普遍。纸质阅读被越来越多的“界面阅读”所取代，表面上看这只是阅读媒介的变化，其实背后隐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转变。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在《后现代状态》—书中对当代科技与认知状态的性质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化革命正朝着人脑认知丧失“使用价值”并屈服于技术理性的趋势发展。^⑧面对缺乏深度、创新与差异性阅读的现状，构建新的阅读范式及相应手段迫在眉睫。

在数字化和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避免全民电子阅读情况下传统沉浸式阅读的衰微、解决碎片化浅读及趋同性阅读的问题成为关键。相较发达国家的阅读研究，中国的阅读研究还相对滞后，对阅读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阅读的理论资源，如果我们能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吸取“他山之石”，以攻本土文化之“玉”，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成熟的阅读文化生态。这既是目前我们面对的文化建设现状，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为此，重访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思想

派别——英美“新批评”和法国后结构主义,通过对前者“细读法”和后者“互文性”理论的考察,有可能发现改善数字化时代阅读文化生态的新启示和新策略。

激活两种阅读方法

(一) 从浅读到深读

“细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早已在古今中外的阅读史上留存痕迹。起源于英国、繁荣于美国的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派别之一,就特别强调“细读”的重要性。

“新批评”经过深入研讨,发展出一种文本解读的系统阅读方法。新批评派鼻祖瑞恰慈指出,语言是靠着相互关系而产生意义的,一个词的多义性阐释有助于另一个词的多义性的界定,最终可以确定这些词语的正确意义。^⑨文本之意义就在文本的词语背后,所以必须回到“文本自身”,揣摩作品本身的词语及其关系,更要仔细推敲文本的局部因素以及篇章结构,以此确认文本的正确意义,避免主观臆断。新批评派的三本经典教材,即布鲁克斯和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和《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就是具体训练细读能力和习性的典范。每一种文类都有其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被列成复杂的清单,针对不同的作品,聚焦不同的问题,经过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以及编者的分析和引导,就会掌握阅读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基本技巧和理解要点。这种针对不同文类的细读方法,如今已成为文学阅读的基本方法之一。

其实,英美新批评“细读法”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精彩论述不谋而合。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⑩,就是一种形象的概括。每一书皆读之数次,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体会,以此达到终生不忘的境界。朱熹也强调“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⑪。他认为:“故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⑫“反复”是指来来回回地阅读,精细把握书中词语;“涵泳”就是深入地体会词语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有歧义或象征性的修辞性词语,只有通过细品咀嚼,方能领会其深意。民国时期梁启超也提出自己的阅读之道,他的经验是最好形成两种阅读习性,“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它,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⑬。虽然梁启超谈的是读古书,但是对于思考今天的阅读文化仍有很大启示。今天我们借助各种电子阅读装置(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可以大量、快速地阅读各种读物,凭借电子装置和数字化资源,我们的“快读”潜能已经被极大地解放出来。但是,正是这样的快读导致了新的问题,即浏览式、跳跃式和片段式的阅读,妨碍了我们的细读或精读习性的养成。常常是阅读很多但收获不多,更缺乏有深度的思考。

回到细读法的本质,就是聚焦词语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比较、阐释和推理。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其一,避免缺乏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力求在词语解析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性理解,新批评特别强调有机统一的结构,意义应该在结构或语境中加以理解。其二,注意不同文本及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性。新批评指出了四种不同的语言类型——日常语言、科学语言、逻辑语言和文学语言,它们各有其使用规则和修辞方法,比如文学语言的表情性和“拟陈述”(虚构性)特征。

如果我们拥有对不同语言类型差异性的自觉，阅读便可以驾轻就熟。

（二）创造性阅读

今天中国的阅读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趋同性阅读的问题。读者对权威、师长、家长、前辈的尊重，远甚于对阅读的自我创新和建构的关注，加之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导向，关于“读什么”和“怎么读”的趋同现象常常十分显著。于是，阅读很容易成为一种对现成答案的接纳、对权威解释的认可、对同一性诠释的屈从。如何改变这种被动性接受的趋同性阅读？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阅读中读者不但要“照着说”，更重要的还要“接着说”，说出自己的创造性理解、批判性观念和独特体悟。

如何更好地“接着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生产性理论对此很有启发意义。其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娃曾写道：“文本因而就是一种生产性，这意味着：首先，文本与语言的关系（文本就存在于这一关系中）是可重新分布的（解构的-建构的），因此最好通过逻辑范畴而非语言学范畴来探究；其次，存在着多个文本的变换组合，即互文性：在一个特定文本的空间内，来自其他文本的几种不同的言语相互交叉，彼此抵消。”^④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文本是被阅读的对象，是一个语言活动的产物，具有生产性（productivity），只有当读者意向进入阅读、与作品语言产生互动时，意义才会显现。比如《红楼梦》中大观园里的吟诗和诗，很多都是在参照、指涉和引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佳作，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互文性结构。当我们阅读《红楼梦》时，不但能体味到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态和想法，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诗文扩展到更多的诗文，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诗歌系统。所以，文本是开放的，可以被重构，各种不同言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和多重可能性。

换言之，创造性阅读就是创造出某种文本互文性关联结构，这既是创造性阅读的 necessary 背景，也是创新性认知体验产生的土壤。陆游指出：“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与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一卷之书，殆不可遽通；此学者所以贵乎博者也。”^⑤中国古代所谓“博览群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需要特别强调，互文性所暗含的阅读策略，不是一般性的博览群书，而是如何在“博览”中建立起“群书”的内在相关性。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创造性阅读的策略，即有效的、富有新意的阅读，总是通过对特定文本的理解进入更多文本的视域拓展和多元理解。回到冯友兰从“照着说”到“接着说”的逻辑，一个合格的读者应当是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要建构起一种文本关联结构，在阅读过程中从不同视角有所领悟、质疑、创新，从别人的文字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形成全新的思想和观念。这也是中国当代阅读产业逐渐从消费性阅读向生产性阅读转变的关键所在，前者局限于阅读“有所知”，只是掌握了相关信息，而后者则更进一步，在有所知的基础上有所悟、有所创，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解，进而使阅读成为自我创新和自我发现。

创造性阅读对读者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虽然“文化身份”取决于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背景，一般处于静态的、被动的接受状态，但“建构”则是动态的、主动的能动状态。阅读作为把握“差异特征”的关键，连接着读者与文本，使读者的“文化身份”在差异性阅读的过程中不是被固化或缝合于既定的历史化、情景化认知中，反而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而改变。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讨论问题时，总是旁征博引地罗列群书，深化观点，使原本看似普通的命题或想法，在互文性的关联中得到升华与丰富。比如，对于“暝色起愁”这一中国古

代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他就从诗经“晦明节乱矣”入手，旁征博引地进入白居易、孟浩然的诗，司马相如的赋，一直到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作，一个很小的主题被拓展为中外文学的普遍性修辞和典型性体验，最终论述了“愁因薄暮起”“暝色起春愁”的人生体悟。^⑥面对大众教育的一元化认知批评体系，读者需从阅读的本质出发，不断地从“照着说”升华至“接着说”，才能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大学：改变阅读生态的重要空间

从读者成长周期来说，大学是青少年阶段文化养成的最后一个关键时期。如今，大学生阅读群体已经拥有了携带方便、价格适中的电子阅读装置。学生通过这些阅读装置，可以自由地下载线上教科书、浏览学科进展、传输研究报告，而不必像早先一般为了特定书目跑遍图书馆。电子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阅读方式，电子书的普及影响着整个大学阅读文化。正如赵勇所指出，印刷媒介建立起的阅读模式“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接受，也包括理解、对话、质疑、反思等……是读者接受的一种深度模式”，“然而，随着新媒介的到来，阅读活动赖以存在的印刷文化根基开始松动，以阐释为基础的深度模式也遭到破坏”。^⑦进而，“很可能不再是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文学阅读，而是视觉语境下的上网、聊天、发帖、读碟、玩游戏、看电视等等，构成了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快速浏览方式，让他们对纸质媒介上的印刷符号望而生畏，对文学阅读敬而远之”^⑧。

显然，任何试图让网络媒介时代后退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读者本身以及读者所处的某些具体文化环境。大学作为文化多样的载体，正如王晓明教授所指出的，可以在两点上实现突破：其一是在认知上，“越是图像时代、电视中心，我们越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往相对冷落的、非图像的地方走……和现今所有别的信息和知识载体相比，书的内容是最丰富的”^⑨。其二是在策略上，从大学教育入手，“‘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要用一切情感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晚会……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⑩。这里其实说明了改变当下阅读文化的一种最有可能落实的方式：通过大学教育让学生把注意力转向书本，爱上深度阅读，并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大学可以团结专业领域的杰出师资，组织阅读导师团队，成立经典导读班，开设单元导读通识课，开展读书沙龙等各类阅读实践活动。学生也可根据兴趣所在，“DIY”适合自己的研读书单。在此基础上，师生共同参加读书节、漂流书目、主题知识竞赛等课内外阅读活动。

笔者相信，在通过大学教育改变阅读文化的过程中，上一节所述的两种方法不仅仅是阅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会真正转化为阅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新批评”的细读法防止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策略，有助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惯；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生产性理论中，可以发现阅读的要旨不仅仅在于有所知，更在于有所悟和有所新，将来自他人的知识和智慧“据为己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理解。

事实上，许多大学都对数字化时代的阅读生态表现出清醒的认知和实践的姿态。国内外不少知名高校都开设了经典阅读的系统课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中国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以南京大学自2015年起推出



的本科生“悦读经典计划”为例,为应对阅读中的“快餐化”现象、彰显校园中细读姿态的多元性,“悦读经典计划”在师生共同策划下遴选出了涵盖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明、哲学与宗教、经济与社会、自然与生命、全球化与领导力等六大领域的经典著作,以导读、研读、线上虚拟读书班、线下系列讲座等方式,从文本材料的细节入手,全力开掘经典著作的多侧面内涵,并集合书中精彩篇章,编撰了上下两卷、共60多万字的《南大读本》,免费发放给每位南大本科生。计划实施后,在学生细读习性的培养和经典理解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效果,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其实,这些尝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培养青年人的深读习性,养成专注沉浸的阅读文化。对此,细读法、创造性阅读法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阅读,是一种能够有效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高全民素质的精神文化活动。时代与文化需要通过阅读来传承,而每一时代又有自身的阅读文化。在数字化时代,必须面对现实,承认绝大部分网络阅读是娱乐式、快餐式的。但另一方面,应站在传承和更新人类文明的高度,利用高等教育等空间来对抗数字化时代的浅阅读、趋同性阅读等诸多阅读方式所带来的问题。面对书籍越来越多的情况,朱光潜特别强调“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⑭。在数字化时代,阅读变得越来越寻常和便利,我们不能被动地为海量的阅读信息所淹没,而是要利用好大学等文化空间,在阅读的内容和方法上有所选择,合理借鉴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培育出新的阅读文化,既与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形态相适应,又能更好地实现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与更新。

注释:

- ①《2018全民阅读报告》,《光明日报》2018年4月25日。
②《全民阅读这十年》,《光明日报》2016年4月23日。
③⑦⑩ 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第152页,第165页。
④ 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
⑤ 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s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140.
⑥《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6.2%,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光明日报》2019年4月19日。
⑦ N. Katherine Hayles, “Hyper and Deep Attention: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Cognitive Modes,” *Profession*, No. 12, 2007.
⑧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

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4页。

- ⑨ 瑞恰慈:《〈实用批评〉序言》,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15页。
⑩⑪⑫⑬⑮ 张明仁编:《古今名人读书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0页,第61页,第66页,第218页,第78页。
⑭ 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6.
⑯ 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102页。
⑰⑱ 王晓明:《中国语言文学本科必读书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5页,第6—7页。
⑲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9—90页。

编辑 李 锋